

#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关鸿 魏平主编 海外学者文丛 蒋梦麟社会文谈

XianDai ShiJie ZhongDe

ZhongGuo

JiangMengLin

SheHui WenTan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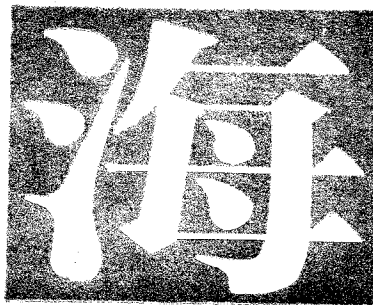


HAIWAIXUEZHEWENCONG

#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sup>69</sup>

蒋梦麟社会文谈

学林出版社



外学者文丛

关鸿 魏平主编

---

##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蒋梦麟社会文谈

---

作者：蒋梦麟

责任编辑：乐惟清

装帧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13 万

印数：5001—10000 册

定价：11.50 元

ISBN 7—80616—275—5/G·49

---

## 出版缘起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特别是时光进入 20 世纪,在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大背景下,更是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才思横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而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使之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批大学者中,有一部分人长期侨居海外,造成大陆读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生涯及本人的学养、处世了解甚少。为此,我社决定推出“海外学者文丛”。诚然,我们并不赞同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某些态度及本丛书中的部分学术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的认同。唯其如此,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状况和学者风貌的一种补充,本丛书自有独特的出版价值。鉴于大陆

在当今语法体系等方面与海外的习惯有些不同,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少量删节,特此说明。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

蒋梦麟,前清策论秀才,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为蔡元培所倚重,被推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还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

抗战期间,他在昆明以北大校长身分任西南联大常委(另外两位常委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在躲避空袭的“空闲”中,陆陆续续用英文写成前半生的回忆录《西潮》。《西潮》记录了自1842年到1941年在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后半段为作者亲身经历,因此,蒋梦麟说,这本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西潮》中文本出现在台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50年代,对当时的年轻人产生很大影响,台湾农村青

年几乎人手一册。这对蒋梦麟是极大的鼓舞，他决心撰写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

他在决定写《新潮》时说：“以前我写《西潮》，那是讲外来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所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可见对蒋梦麟来说，《新潮》较《西潮》更为重要。可惜《新潮》仅开了头，写了几章，他便病逝了。

罗家伦在称赞蒋梦麟的写作风格时这样说：“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的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这正像蒋梦麟做人处世的态度。若不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罗家伦还引用王安石的两句诗来形容蒋梦麟的生平与写作风格：“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本书的第一辑是未完成的《新潮》五章和《西潮》中的三章，各自都能独立成篇。第二辑是他写的几篇怀人纪事之作。

编者

1997年1月

# 目 录

卷首语 .....	1
新潮 .....	1
民国初年 .....	41
中国生活面面观 .....	92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	124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	179
蔡先生不朽 .....	182
追忆中山先生 .....	184
忆孟真 .....	189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为纪念“五四”与艺术节而作 .....	193



## 引 言

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个人的经验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经验，也是如此。

鸟兽能把经验传给它们自己的儿女，可是影响本能的变化是很有限的。

小松鼠在秋天会跟着它们的父母挖地穴藏果物，小鸡在老母鸡的教导下懂得怎样逃避在天空中盘旋的飞鹰，这些知识固然是从仿效得来的，但大部分却是本能的动作。

学习的“习”字解释为“鸟数数飞”。不断地学飞

叫做习。“学”字含有原理的意思多，“习”字含有仿效的意思多，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俗语通称“学习”，是含有两重意义的：一面根据思想而学，一面根据仿效而习。故人类的进步是靠学与习交互而行的。

学是学前人的经验，习是习前人的榜样。“以身作则”是说给人家可以练习的一个榜样。“格物致知”是指示一条求学的道路，在事事物物里求知识。

禽兽是靠本能生存的，而人类却能学能习，并能将学到的和习成的经验传给后代。

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子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人们的一个通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们的一种痛苦。

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洪涛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以前我用英文写的一本书，名为《西潮》，是战后在美国出版的。后来又在台湾发行了中文本。《西潮》是写由西方来的外力影响了内部的变动；《新潮》是写内部自力的变动而形成的一股巨大潮流。虽然这种新潮的勃起，也可以说是受了西潮的激动，不过并不完全是受外来的影响，而是由内部自己发展起来

的。“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发刊一本杂志，也叫《新潮》，当时英文译为“The Renaissance”，就是代表我国文化复兴的意义。当然本书采用《新潮》为名，是受了那本杂志的启示的，而且这新潮之掀起，北京大学是很有关系的。

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最近十余年来，把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从象牙之塔的学府里，移植于台湾广大的农村里，而得显著的实效。因此又得了不同的经验。

著者现在且把这几十年来在大陆和在台湾的前后的经验写出来，希望供青年们参考和抉择。

青年们，不要想找万灵丹啊！因为世界上是没有服了能使百病消散的万灵丹的。我们要眼看天、脚踏地、看得远、站得稳，一步一步地前进，再前进！

## 第一章

我国自 1937 年始，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敌军铁骑所至，毁坏了广大乡村之生产组织，又因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区域内征兵征粮，窒息了人力和物力。战事終了后数年，中美两同盟国政府，想把萧条而生产落后之中国农村，用近代科学方法，重新建设起来，于是合组了一个委员会，叫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要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和问题，便包了飞机，计划了一个旅

程,以南京为中心,分向全国各地作穿梭似的飞行。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见我的学生来帮我们的忙。

有一次我们的包机临时在汉中降落,汉中位于汉水上游,是盆地中心,故物产丰富,昔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在这里推行农村建设工作。站在机场中瞩目四望,但见阡陌纵横,麦浪迎风,极视线而无际,当年诸葛亮便是屯军于此、北伐中原的。

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有一妙龄女郎迎面走来问我:“校长,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是哪一位?我们要找胡宗南将军。”

“我是您的学生,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在机场里服务。听说胡宗南将军正在开军事会议,今天恐怕找不到他。”

于是有几位学生引导我们到一个小饭店。菜肴十分可口,餐后颇有齿舌留香之感。等到算帐的时候,胡将军的副官已先付了帐,使那几位学生因未做成东道而大为扫兴。

饭后即直飞兰州,大家因目的未达,不免失望。以后胡将军虽曾派代表来广州请我们再去,但我们已鼓不起勇气,婉辞谢绝了。

农复会的同仁们,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们,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机上，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开玩笑说：“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

“那是不会有的了！”我回答。话未说完，有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走来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对着我叫了一声“校长”。

“你是哪一位？”我问。

“我是您的学生啊！”他回答。

“你怎会在这里？”

“我是副驾驶员。”

“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

“是很早以前，由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

这时我可抖了，我就很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谈笑间，飞机已接近台湾的上空了。

我们向窗外望去，但见海天一色，清波荡漾，云朵在晚霞中向后飞渡，使我不觉顺口吟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因为当时大陆情形，已够使人担心了！

正在沉思的时候，在斜阳普照的一幅美景里，松山机场已经在望。映入眼帘的，一边是丛林蓊郁的山峦，一边是阡陌纵横的田垌。虽然眼前风景如画，但当时我们所想的只是如何工作的问题。美丽的宝岛风光，只有留待将来再欣赏了。

回溯抗战初期，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的日本木更津飞机队，曾到杭州轰炸笕桥飞机场。他们派了五架

轰炸机，却没有驱逐机保护。到了杭州以后，我们笕桥的防御人员当即迎战。五架敌机，竟打下了四架，另一架狼狈逃去，飞到绍兴附近，终于坠毁。我曾经到那边去看过，见到那跳伞降落的日本飞行员。我问他，他不肯说什么。以后他才跟管理他的我方人员说了，当五架日机从台湾起飞的时候，日方的司令官说：“杭州方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驱逐机，你们放胆去炸好了。”

这时见到当年日军轰炸机基地的松山机场，不禁勾起我那段回忆；那时在杭州我还是第一次领教敌机轰炸的滋味，那恐怖的经验，竟使我永生难忘。

下机后，便有省政府派来接我们的人上前寒暄，然后登车驶入市区。我坐的那一部车子里，也有一位我以前的学生，他告诉我，这是省政府最好的一部汽车，专给我用的。他并很幽默地说：“这部汽车，是以前的省主席夫人的座车，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今天给校长坐。”我笑了笑说：“那位主席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听了谦恭一笑，也便不讲什么话了。

汽车不久便到了圆山桥附近的一个政府招待所，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当时已经有几位农业人员等在那里，报告台湾农业的近况，并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推行工作。后来我们到省政府去见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我们对他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

产以后,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目的是要均富,但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个政策,经我代表农复会说明之后,辞修先生听了非常赞成,说:“好啊,我们很欢迎。”

我们又说,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讲生产,就必须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否则生产量不会增加的。陈辞修先生说,他赞成这个办法,在他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也曾经搞过土地改革,收效很大,所以他也想在台湾做。不过目前的台湾百废待举,单凭他一个人与政府的力量,恐不易做到。经费既不够,技术人材也不足,是不是农复会愿意帮忙?我当时就代表农复会说:“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的决心,农复会一定尽量帮忙。”主席说:“好,我们就这样办吧!”

经我们在全国好多地方视察之后,深觉最重要的首推水利问题。土地必须有水,才能生产。至于其他各种生产方法,当然也应注意:台湾是亚热带地方,容易发生虫害,而且传布极速,应加强防治;还要注意肥料,改良旧品种,介绍新品种。不过,要增加生产,单靠技术和物质是不够的,组织农民也是不能忽视的一

件事。我们曾经派人调查过，台湾有个日治时代留存的农会制度。不过这个农会掌握在地主手中，它的宗旨并非替农民谋福利，只是为以前的殖民政府在台湾调度粮食供给日本之用。实际上那只是政府收购粮食的一个机关，我们建议把这种农会改组。辞修先生对我们的建议都很赞成。商讨结果，决定一方面将农会改组为真正的农民的农会，一方面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关于生产方面，则着重水利建设，注意施肥，因为台湾土地是没有大陆肥沃的。其余像防治病虫害、改良品种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办法，我们都详尽地研究过，务求达到改善国民生活的目的。

离开省政府后，大家都觉得很愉快，感到这位省主席决断力很大，看来他的行政经验很丰富，我们可尽量和他合作，以推行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的计划。

由于这几个月的经验，我们深知政府方面如没有决心，那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省主席既然有此重大决心，我们对于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和统筹的农业计划，都抱着很大的信心。

于是我们到各处调查了一下台湾的情形，又看了几个试验场，并与农业界人士会谈过，才乘飞机到了厦门。在鼓浪屿一个西式的旅馆里，我们开会讨论改进台湾农业与推行土地改革的办法。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离厦门不远的龙岩县帮助土地改革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据该县出来的人以及我们派去视察的人说，那里自土地改革以后，生产的能力



增加了,农民的耕作兴趣也提高了,社会一下子繁荣起来。因为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后,都加倍努力耕作。农民们因丰衣足食而显得很高兴,连土匪也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很太平。从小地方看来,台湾若能够把土地改革办成功,也会一样的安定而富庶。目前台湾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快乐,在当时的龙岩县就已经看见具体而微的一部分,也因此增强了我们当时主张土地改革的信心,知道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国民的生活水准的确可以提高。

我们在鼓浪屿开会后,就飞往广州,又转飞成都,在那里研究四川土地改革的问题。当时的省主席王陵基先生,对于这件事情,也相当热心,赞成在那里进行土地改革。台湾做的是三七五减租,那儿做的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与三七五减租,相差甚微。但今日台湾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比较减租还要进一步了。那时候会里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非土地改革不能振兴农村,还有一部分人却不赞成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改良农村。彼此虽然并未公开辩论,但对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却各有主张。至于美国委员方面的意见,似乎以为这个问题还是让中国委员们自己决定为是,故未公开表示赞成与否,不过在谈论之间,还是赞成土地改革的。中国委员们虽然无人公开表示反对土地改革,但积极主张非如此不能复兴农村的却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大概这少数人在那时候的言论举动过于积极,所以有一位委员在背后批评我们说:“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